

第一章

21 世纪国家政治安全的新理念

1. 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和平与安全，历来为人们所憧憬和奋斗，有关安全的话题，是一个历久而常新的话题。

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安全，其内涵如此狭窄，以至于它只是政客和外交家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似乎没有更多的人去关心它。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安全，一直是有关军事方面的概念，按照以往的观点，人们往往把安全等同于国防和对外政策，等同于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并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国际事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中国古代军事上的安全“强边”与“固本”的关系历来是相行并重的。边疆的稳固，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关心的第一要务。

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认为国家安全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的，只要对手继续存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有绝对的安全。于是各国纷纷强调以军事实力追求国家安全，竞相扩充军备，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实现过绝对安全；任何追求绝对

安全的行为，其结果一定与其初衷背道而驰，一个国家可能会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却无法赢得真正的和平，每一个国家都时时处在战争威胁之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治安全长期得不到实现。

从公元前 15 世纪到现在，人类社会走过了 3 500 余年的历史，在这 3 500 多年的历史中，地球上大约发生了 14 000 多次战争，真正没有战争记录的历史时期只有短短的 200 余年。而从 18 世纪至今的 300 多年，更是战乱频繁，没有一年不曾出现过武力争端。在长期战乱的背景下，政治安全又从何谈起呢？

政治安全虽然没有真正实现过，但是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对它的追求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去单纯意义上的政治安全，其存在方式发生过多次变化。

霸权稳定下的政治安全在历史上曾经十分风光。这种政治安全理念源于“罗马治下的和平”。罗马和平是征服的和平。实际上，置于罗马和平之下的较小国家，没有哪一个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所有的国家都不过是罗马的附庸，是它的一粒小棋子。这些国家并不是主动要选择这种命运，只是不得不接受罢了，因为他们的强大邻国拥有不可抗拒的威力。

罗马和平给了 19 世纪的英国以极大鼓舞。当时的英国（包括殖民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1/4，拥有一支比任何两个其他海军强国联合在一起还要强大的海军，它主宰了西方大部分地区的命运。到了 19 世纪末，许多美国人也迷恋罗马和平，一些政治家公开宣扬美国应成为世界的“组织专家”、“世界文明的受托人”。

这种所谓的“霸权稳定下的政治安全”是以“霸权稳定论”为理论基础，但是这一政治安全理念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这就是霸权本身并不能持久，绝对的霸权总是导致绝对的衰落，况且它本身就是违背安全宗旨的，必然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本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计划的彻底失败就是明证。

霸权稳定下的政治安全既然不能实现，人们就想到限制霸权，即防止任何一个国家独霸世界，于是均势下的政治安全理念出现了。这种理念实际上是一种为独立而担忧的国家实行联盟的保护策略，以反对另一国通过称霸世界而建立世界帝国的阴谋。这种政治安全理念曾经保护过一批弱小的国家，但是应该看到，在这种政治安全理念下之所以能够出现某些政治安全假象，实际是因为试图称霸的国家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它面临着太多的敌人。

均势下的政治安全理念被残酷的国际政治现实否定了，人们开始探索一种集体安全保障的体制，于是所谓的集体和平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际联盟，就是这样一种政治安全理念的产物。这种政治安全理念，支撑了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但是国际联盟未能防止任何大的战争，在维持国际秩序方面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明确的正义标准，并且采取行动要取决于大国的一致意见。尽管国联并没有导致集体和平，但它的存在对后来关于和平的价值准则和行动原理提供了启示，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下，人们重新追求要有一个国际机构来维持世界和平，于是联合国诞生了。但正如国联一样，由于其固有的缺陷，联合国往往成为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争夺权益的场所。当然，现在联合国的作用开始越来越大地得到发挥。

二战后至今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大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核武器的存在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由于这个原因，二战后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安全理念，即“核和平”。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人类的和平已经建立在超级大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核恐怖均势！但是，以核威慑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安全理念，有着明

显而极端危险的缺陷：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甚至对于某个恐怖主义组织来说，拥有几件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高技术武器都不会是太难的事情了。拥有几件核武器的国家或组织与拥有强大核力量的国家相比，其总体实力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在核武器问题上，是不存在什么均势的，无论多少核武器，它的结局必然是毁灭，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这个命运。所以，脆弱、幼稚的建立在“核和平”上的政治安全理念显然是不对的。

和平存在的方式层出不穷，政治安全理念也不断花样翻新。翻开历史，我们发现和平与安全并没有能够真正实现，战争却一再把人类推向死亡的边缘。究竟哪一种政治安全理念更适合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呢？

2.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安全新理念

就在我们对传统政治安全理念困惑不解的时候，新的安全问题又出现了。这一次，安全在更广阔的范围向人类提出了挑战。其背景就是全球化。世纪之交，全球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意识正日益成为现实。

全球化的过程始于工业革命。还在 1848 年 极其睿智的马克思就已预见性地指出：“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伴随着一次次新的技术革命而来的是崭新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1942 年发生的电脑革命把人类带入信息时代，1945 年发生的

核能革命把人类带入原子时代,1957年发生的航天革命把人类带入太空时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全球化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突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与竞争性。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

全球化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的结果。农业社会不同民族与国家的隔绝,是农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农业依赖的是个体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并非都有普遍性与可重复性。而工业社会依赖的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有普遍性,它在一国适用,对其他国家也适用。

全球化是信息革命的必然产物,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以电脑、电视、人造卫星为标志的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将全球联结成一个整体,造成了全球性的信息同步效应。当代科技革命的不断加深,使世界各国的生产越来越国际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被纳入到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特别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骤然加速,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全球化也是上述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必然结果。任何创造同时也是一种对原初平衡的破坏。人的创造性越强,破坏性就越大。核威胁、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日趋严重的负面效应,造成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只有经过全球合作与努力才能加以消除和解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如:如何保护环境,防止人类生存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如何制止艾滋病的传播,扼

制这一“20世纪瘟疫”的蔓延势头；如何与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分子作斗争；如何反对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如何防止白色恶魔吞噬人们的身体和心灵、毁灭国家的经济；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不对政治安全提出了新的课题，新的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说，解决它的难度并不亚于解决传统的政治安全问题。实际上，现今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几乎都与安全问题有关，安全的概念正在呈现出更加复杂和多层面的特征，只注意安全的军事层面已远远不够了，它还涉及能源、资源、环境、人口、空间和海洋等问题。毒品、传染病、颓废的精神垃圾、有损健康和环境的生活垃圾、有害植物生长的境外动植物病菌、走私、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和平演变”，都应该列入国家政治安全的范围。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一种新的政治安全理念出现了。人们日益认识到，安全的内涵并不只包含军事安全，也不等同于保持某种特定的国际关系，国家安全是利益的综合体，它所涉及的范围要大得多。上述这些方面的问题与军事安全相比，已具有了同样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人们提出了扩展和重新界定安全概念的问题，并在传统的军事安全层面之外，又提出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安全等问题。把安全概念从军事领域扩大到经济、社会和生态等领域，并从以一国政治安全为中心扩大到全球政治安全，这无疑是政治安全理念的一次革命，具有积极的意义。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指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议事日程已出现在我们面前。能源、资源、环境、人口问题、空间和海洋的利用问题已与那些传统上构成外交议事日程的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及领土争端问题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和罗博特·基欧汉认为基辛格所

列的问题还可以扩大，因为对内与对外政策已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叠。美国政府主要九个部以及其他各种机构分别承担起范围广泛的对外事务上的责任。

新的政治安全理念认为，所有这些新出现的政治安全问题，都涉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要解决这些问题，世界各国都负有责任，每个国家都必须紧密合作，采取共同的对策。目前，世界各国在“超国界”行动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如：美国为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提供装备和人员，一起开展根除毒品斗争；荷兰提供大笔资金在 10 多年的时间里，把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巴尔蒂斯坦荒漠变成了一片绿色的丛林，为净化世界的空气作出了贡献。近年来，保护被称为“地球之肺”的巴西热带雨林成为人们所关心的焦点，有人甚至建议建立一个国际机构，筹集资金帮助巴西政府，使这片原始丛林免遭滥砍滥伐的厄运；为了追捕违法分子，各国刑警往往采取跨国界的联合行动。

新的政治安全理念要求人们改变过去的对抗性政治思维。全球相互依赖要求人们看到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不仅有对抗，有较量，还有共同的利害。如果无视世界联系的深刻性和利益的共同性，热衷于对抗，那么势必置人类于不能自拔的境地。激烈的对抗会给无辜百姓带来更多的痛苦与灾难，而这是与人道主义的历史潮流相违背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昔日的兵戈相见政治安全理念，正变成持久的综合国力较量。

新的政治安全理念要求各国树立这样的理念，即发展自身，而不是消灭对手。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题的新历史时期，不懂得发展自己，却寄希望于搞垮对手；不首先抓好自己的事情，却迷恋于阻挠对手的发展，这种陈旧意识和战略，只能导致自身的萎缩、停滞不前。立足于发展自身而不是消灭对手，世界各国就容

易找到更多的共识，整个国际环境就较为缓和、平稳。

3. 更广阔的范围 更复杂的内涵

在全球化背景下，政治安全理念所涉及的内容更为丰富，所关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新的政治安全理念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的民族冲突和宗教纷争将继续延续 并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两极体制掩盖下的各种矛盾包括民族、宗教矛盾更加尖锐化和公开化。以民族自治、民族回归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思潮再次兴起，形成民族重新组合的强大潮流，导致民族、宗教矛盾愈演愈烈，引发了一系列的战争和冲突。以亚欧非结合部为中心 包括中东欧、巴尔干、中东、非洲、西亚、中亚和南亚 形成了一条民族主义地震带 不论是主权纠纷、领土争夺还是教派之战，这些武装冲突的背后都燃烧着民族主义的导火索。据统计，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共发生了 30 余场地区性战争，而与民族矛盾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战争就占了半数以上。世界范围的宗教、民族冲突日益扩散和加剧的趋势给国际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2) 文化和文明的冲突。

全球化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对于人类社会各种因素中相对稳定的文化与文明也产生了冲击和影响。现在，人们发展本民族、本国文化的同时，越来越注意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协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正在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对国家安全也构成了严重威胁。

社会的剧变引起了传统文化的危机与失落。在频繁的文化更新中，人们会产生普遍的文化失落感。失去传统，文化便成了无根之草。全球化过程中，信息文化会带来大众文化的泛滥。文化快餐的普遍流行，文化流于时尚和媚俗，导致了崇高与英雄主义气质的失落，文化层次得不到升华。

最应该引起我们警醒的是，文化与文明的全球化会造成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甚至导致某种文化入侵与文化殖民主义。西方文化正借助其财力与技术的优势，大口吞噬着第三世界那古老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化。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亨廷顿指出，文明的冲突将是下一世纪的主要冲突形式。这一说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

(3) 保护生态环境——国家政治安全理念的全新内容。

有学者称“环境将是‘21 世纪初期的国家安全问题’”。人们注意到，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加速恶化。大气、河流和海洋的污染越来越严重，森林在减少，沙漠在扩大，气候在变暖，生物物种在消失，耕地减少和土壤劣化在加速，臭氧层正出现越来越大的空洞。一些跨国的环境问题如果不能依靠和平手段得以解决，就会成为国家间紧张局势和武装冲突的新根源。

(4) 危及政治安全的暗流——难民与移民。

难民一般指国际难民，是指那些流离失所、向别国政府当局寻求保护以获得生计的人。地球上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185 个是联合国成员）的大多数都面临着难民和移民问题。截至 1997 年年中，全世界共有 5 700 万难民（包括在国内被驱赶的人）。除了难民问题，全球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现象也同样令人担忧。大规模人口迁移导致了多种移民，包括劳工和贫穷移民，他们也被称作经济难民。另一种难民即环境难民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由

于可耕地日益减少，一些人被迫离开有限的土地，另谋出路。人们也称本世纪是“移民的世纪”。

80年代以来，难民潮和移民潮都不断上升，这个爆炸性问题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为解决贫困问题所投入的钱并不少，可是贫困人口却直线上升。联合国估计绝对贫困的人口已达13亿，世界人口中每5个人中就有一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他们的人数每年都增长2500万。全世界人口的20%生活在50个最贫穷的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内乱、人口、环境问题造成的难民和国际性人口迁移必将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都产生影响，无论是主动接纳移民的国家，还是被迫接纳移民的国家，都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化解大规模移民潮对国家安全的消极影响。

(5) 恐怖主义及毒品犯罪。

冷战结束后，越来越严重的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已发展成为对全世界的威胁。进入90年代，几乎每年都要发生重大的恐怖事件，几乎每年都有某些国家的领导人遭恐怖分子袭击。国际社会中的许多国家，都受到了这股浪潮的冲击，不得不投入这场“永无休止的地下世界大战”。全球通信技术和武器装备，包括核、生、化武器在内的武器扩散，已经给恐怖主义组织、分裂主义运动、贩毒和犯罪集团实施其破坏和恐怖活动提供了巨大的动能。事实表明，21世纪国际社会面临着严峻的反恐怖形势。

(6) 知识经济将改变国家政治安全理念。

知识经济的兴起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它必将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产生革命性的深远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首当其冲。

知识经济时代，国家政治安全观念将发生巨大变化。过去，攻城掠地，控制资源，是战争的起因和目标，国家安全的概念更多地

表现在疆界的稳定，安全是一个和主权联系在一起的、有着明确目标的、可以控制的固定的概念。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安全观念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安全和主权观念，它是一个综合安全的概念，任何单一方面的安全都不足以构成整个国家的安全，在这个综合的整体之中，以信息为主要特征的知识和科技的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经上升到至关重要的地位。

(7) 经济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到各国的重视。

在诸多的全球化问题中，经济全球化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可以说，全球化的实质便是经济全球化。目前，以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国交流的迅速扩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正在形成一股潮流把人类带向 21 世纪。

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我国的经济面临风险与挑战。经济全球化加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难度。最明显的一个挑战就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盛行，并且更加具有隐蔽性；国际金融市场投机盛行，金融风险增大。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震惊全球的金融危机此起彼伏，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风暴，表明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化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隐患；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我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对我国经济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从负面影响看，它会给中国今后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畸形、环境污染等不良后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的经济资源以及新的生存空间的争夺，将在国家政治安全的天平上占据更高的比重，未来围绕自然资源特别是海洋资源而爆发的冲突将更加频繁。这些新的生存空间包括海洋、海底和外空间。各国决策者将会以更大的决心去保护本国的资源不受外部侵略者掠夺。总之，未来的冲突将主产生于对新生存空间的争夺，战争将不再是为了征服他国或占领

领土 相反 外层空间、海洋和海底将成为冲突的焦点。

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安全问题与政治安全问题密切关联。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衰退，政局不稳，社会动荡，表明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空前突出，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家安全不仅包括政治、军事，也涵盖经济等内容，而且经济安全更具现实意义。正如国际舆论在评论经济全球化时所说的：“人类多种多样的经济、社会正在被并入由西方经济强国主宰的单一西方经济。”

战后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股新兴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力量对比和基本格局。然而，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依旧实行强权政治，发展中国家仍处于无权地位，发展民族经济的愿望受到严重阻碍。所以，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从而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它们倚仗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着世界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控制着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在经济上推行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和体制，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国际组织设计的调整、改革方案，甚至不顾国际关系中不干涉内政的准则 使用一切手段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 把它们的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东南亚金融危机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舆论和有关国家要求重组国际金融机构，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限，敦促国际社会宣布货币操纵为非法行为。

第二章

民族主义与政治安全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究竟有多少个民族？一般认为有大小两千多个。其实，这是个仅供参考的数字，因为目前还缺乏完整的有关世界民族成分调查的材料。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民族”的概念理解不同，有人把“民族”和“种族”混为一谈；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至今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有的国家则在人口统计中不划分民族，甚至否认本国有不同民族存在。

尽管世界上民族众多，但从人种的类型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大人种，即欧罗巴人种（白色人种）、蒙古人种（黄色人种）和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黑色人种），此外，还有一些红、棕等混合人种。

世界上超过 1 亿人的民族，有汉族、印度斯坦族、美利坚族、俄罗斯族、孟加拉族、大和族和巴西族。1 亿人以下、百万人以上的民族近 280 个。还有 1 800 个民族人口很少，总计不到世界人口的 4%。

1. 信息时代种族和国家会消失吗？

正在到来的信息时代对人类社会的改变，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不过，在千变万化之中，总有一些不变的事物。就世界政治地图而言，最不受信息时代影响的恐怕莫过于种族之间的区分。种族之间的差异是因人的体形特征、遗传学构造这些最为基本的差异而存在的，它需要经过更为漫长的时段才能融合。两个黑人男女生不出一个白人孩子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说明种族差异绝对是有生物学基础的。

著名的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回忆道：“当 1931 年我父亲告诉他剑桥大学的学术导师，他计划去东非寻找人类起源的化石时，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导师要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亚洲而不是非洲。”只是到了后来，那些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说法才销声匿迹了，这固然是由于生物学、考古学的进步戳穿了那些谰言，但政治气候的变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种族主义为人类主流社会所不齿。

随着种族主义在主流社会由明转暗，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当人们涉及到遗传学以及智商这个有关人类自信与自尊的敏感领域时，都倾向于缩小而不是夸大人类的种族差异，不管他是科学家，还是一般民众。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他们不致于受到批评。这种倾向的用意是极为善良的，他们真诚地希望各种种族能够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而不要去过多地提那些有可能造成裂痕的事。

不过，种族之间的差异是确实存在的，谁也无法否认这一点。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不同种族在肤色、头发、眼睛、面容、头型、体型，甚至身体所发出的气味方面明显地不同，我们一眼就能辨别出

来，根本无法视而不见。不管这些差异是由于遗传基因造成的，还是由于对气候的适应造成的，还是什么其他别的原因，我们都无法视而不见。既然这样，把差异摆出来，并加以探讨和研究，以谋取解决之道，总比掩盖差异好得多。在信息时代尤其如此，因为在信息时代什么都掩盖不住。

更令人担忧的是，信息时代不仅存在着难以消除的种族差异和因差异引起的冲突，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种族问题。

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大大地促进了生物学的进步，生物学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威胁，有些是十分可怕的，其中包括发展“种族识别生物武器”的可能性。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曾引用 1992 年瑞典国防研究院主任博·瑞贝克的话说：由于我们能够辨别出不同种族与人种的 DNA 差别，“我们将有能力区别黑人、白人、东方人、犹太人、瑞典人、芬兰人之间的差异，并能开发出一种用以专门消灭某一特定人种的制剂。”

根据人类各种族基因差异的特点，要想造出能够精确地识别某一特定人口，并加以灭绝的生物武器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完全有可能造出一种生物武器，它可以杀伤 A 人口中的 80% 却只杀伤 B 人口中的 50%。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这种生物武器不能精确识别，那么，又有谁敢使用它？政府也许不敢，但很难保证非政府的种族主义组织、恐怖主义分子也这么理性地考虑问题。

如果把技术上的可能性和西方种族主义的死灰复燃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人们很难不去想它的可怕后果。更要命的是，信息技术也给煽动种族主义提供了便利手段，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绝大多数是白人。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还可能用技术制造出新的人造

种族。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21 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就曾表露过这样的担心。遗传工程完全有可能将精英集团的权力、财富等“固化”到他们的遗传密码中去。那时，精英集团不仅在思想上、生活上与一般大众隔绝，而且在人种上也与一般大众距离越来越远。这将是希特勒的种族优化思想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新版本，而且它比三四十年代更为可怕。

21 世纪，种族非但不会消失，由种族引发的各种问题却会更加复杂。

下个世纪，国境线依然是大多数世界地图上最为醒目的轮廓线之一，各个不同的色块仍将代表不同的国家，而不是代表别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还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演员。但信息时代确实有不少因素模糊了国界，跨国界活动越来越多。在“一体化”、“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单个国家在越来越涉及全球的贸易问题、金融领域、跨国犯罪等许多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比如赌博，美国一些州明令不准赌博，但赌场老板把网上赌场设在了加勒比海上——其实只要搬一个服务器过去就避开了美国的法律。还有版权问题，对于网上出版物来说，哪里版权法松它就可以搬到哪里去。信息技术使得许多问题变成了跨国界的问题，单一的国家处理这些问题很难奏效。

信息社会中，国家对武力的垄断地位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今天，任何人都可以用从市场上买得到的高科技产品制造令人生畏的战争武器。现代的整套技术系统是如此昂贵、庞大，即使是美国军方也难以单独开发、单独使用。这决定了现代技术系统必须走军民两用的道路，而且对所有消费者开放。托夫勒曾提到，数百万美国家庭中安装的有线电视盒中的高精密码加密技术可用于导弹导航；任何人有钱都可以从俄罗斯、法国、日本甚至美国订

购到太空监测影像服务，精度比 20 世纪 70 年代军方所拥有的技术要好得多。俄罗斯提供的服务分辨力达到 5 米，不久就能提高到 1 米，这意味着通过商业购买就可以获得精确度达到 1 米的诸如军队坦克、导弹部署位置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地对待非国家的武装力量。

要建立强大武力的另一个要素是资金。今天跨国犯罪集团调动资金的能力十分惊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毒品与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 1990 年提供的数字说，世界上大约有 3 000 亿美元是从贩卖毒品中获得的。英国国会国内事务委员会 1989 年的一份报告说，估计有 18 亿英镑的毒钱流过这个国家。联合国官员最近估计每年犯罪集团的收入为 7 500 亿美元，其中 4 000~5 000 亿为毒钱（美国缉毒局估计）。而全球联网的金融系统十分有助于这些钱的转移，一笔钱在 24 小时之内就可以走十几家银行。“网上银行”的建立更是为洗钱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此庞大的财富，从中抽出一些来发展武力并不太难。

除了钱，还有组织能力。有组织的犯罪过去的规模就不小，但现在的趋势是跨国犯罪组织建立跨种族、跨文明的“战略同盟”关系。现代通讯技术的迅捷及金融系统转移金钱的便利和隐蔽无疑地促进了这种联合并使之效能大大增强。在此规模上组织起来的犯罪集团足以和多国政府周旋一番。

因此 21 世纪或者更远的信息社会里，国家不会消失，但非国家的力量却与日俱增，不容忽视。

2. 危及美国政治安全的种族歧视

美国白人歧视黑人的罪行罄竹难书。黑人在北美的历史几乎